

中产阶层对外来人口的偏见研究：
基于厦门的调查数据

王嘉顺 副教授

华侨大学社会学系

电话：13860112042

通讯地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集美大道 668 号华侨大学哲学与
社会发展学院，361021

电子邮箱：key_596@163.com

中产阶层对外来人口的偏见研究：基于厦门的调查数据

摘要：本文分析城市中产阶层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偏见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从偏见的个体和群体两个角度出发，文章提出了关于权威人格倾向及群际接触对偏见影响的7个假设。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的偏见程度更强烈，年龄、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及与一般社会成员的交流意愿对偏见没有显著影响。对阶层之间差距程度的认知水平、对权威认同程度、自卑感、社会距离、跨社会地位的交往频率以及是否邀请过外来人口到家里做客对中产阶层对外来人口的偏见有显著影响。这些影响同已有的发现并不完全一致。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群际接触有可能降低偏见的产生。

关键词：中产阶层 外来人口 偏见 群际接触

A Study on the Middle Class Prejudices against Migrants

WANG-Jiashun

Abstract: This analysis of the urban middle class social prejudice against migrant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the prejudices perspective of both individuals and groups, presented on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tendencies and inter-group contact 7 assumptions about prejudice. Study found that prejudices are more strongly in women than in men, age, education, marital status and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members of the general community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prejudices. The class gap between cognitive level, the authority of the acceptance, self-esteem, social distance, across social intercourse frequency and whether to invite outsiders to home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middle-class prejudices against immigrants. These effects have been found to be identical.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in new, inter-group contact have the potential to reduce prejudices.

Keywords: middle class, migrants, prejudice, inter-group contact

在众多关于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社会交往以及社会认同等研究中，社会歧视是常被提及的现象，它往往发挥着负面性、阻碍性以及排斥性的影响作用。学者有时也使用社会偏见来代替社会歧视，或者并列使用这两个词来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基础用于定义社会排斥（崔岩，2012）。但是社会歧视与社会偏见具有本质上的差异，两者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也各具特征，不能混为一谈。歧视通常跟不平等的社会处境和社会待遇联系在一起，它始于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优越感，并且一般通过排斥性的制度安排加以确定，它更多地体现在性别、种族、民族、地域、年龄、相貌等先赋性特征上。偏见是一种态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一种刻板印象。它一般存在于群体与群体之间，并且给受到偏见的群体带来负面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情绪反应式的判断，侧重表现为对受到偏见群体的厌恶和反感（Allport, 1954; Stephan and Stephan, 1993）。可以说，歧视与偏见分别体现出社会行为与社会态度的意义（朱力，2001），并且“社会歧视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是社会偏见这种社会态度的反映，后者是前者的心理根源”（黄家亮，2005）。由于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如果在研究中混用歧视和偏见这两个概念，会给研究结果带来一定的误识。在国外的同类研究以及国内的社会心理学领域，偏见与歧视已经被作为不同的现象加以区别对待，但是目前国内社会学领域的绝大部分有关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和社会交往的研究，要么忽视歧视与偏见之间的差别，要么直接以歧视代替偏见，并且偏见往往作为影响因素被直接引入研究讨论之中，而对城市新移民受到的偏见本身，我们仍然缺乏较为细致的认识，特别是来自于实证研究的发现。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一）关于偏见的两种研究路径

正如社会心理学存在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两大研究传统一样（杨宜音，2006），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的偏见存在两条研究路径，分别从个体层次和群体层次展开，两个研究层次关注的焦点不同。从个体层次展开的研究，关注导致偏见产生的人格特性。该传统始于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他基于量表测量和临床访谈收集到的数据，分析出具备权威主义人格的九个特质，即因袭主义、权威主义服从、权威主义攻击、反自省性、迷信与刻板印象、权力与强硬、破坏性与犬儒主义、投射倾向以

及性取向。而这些人格特质又可以概括为因袭主义、权威主义服从和权威主义攻击三个核心成分，具备这些特质的个体更易对外群体表现出偏见（Adorno et al., 1950）。¹ 自阿多诺之后，权威主义人格理论又相继进化出右翼权威主义（Right Wing Authoritarianism, RWA）和社会支配倾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SDO）两种理论流派（Altemeyer, 1998; Sidanius and Pratto, 1993; Pratto et al., 1994）。它们二者虽都是源于权威主义人格理论，但是侧重点不同。首先，右翼权威主义理论在阿多诺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化对权威主义人格特质中三个核心要素的澄清和测量，而社会支配倾向理论则强调权威主义支配的重要性。其次，从偏见的产生过程来看，右翼权威主义理论认为具备权威主义人格特质的个体相对一般个体对冒犯传统价值观的行为更敏感，并将其视为群体威胁的重要来源，而一旦感知到这种威胁，就会对造成威胁的群体产生偏见（李琼、郭永玉，2007）。社会支配倾向理论认为个体的支配倾向不同，高社会支配倾向者偏好加大不同群体间的差异，并期望优势群体更多地支配劣势群体，而低社会支配倾向者则偏向缩小不同群体间的差异以增加社会平等，并期望优势群体更少地支配劣势群体。而社会支配倾向正是通过影响社会不平等的程度来促发偏见的产生（李琼、郭永玉，2008）。权威主义人格理论的这两条分支都突出特定人格特质在偏见产生过程中的直接作用，但是以达基特（Duckitt, 2001; Duckitt and Sibley, 2007; 2010）为代表的学者指出右翼权威主义和社会支配倾向两种所谓的人格特质更接近于一种社会态度，而具有不同人格的个体经由该社会态度的中介作用才会产生社会偏见，所以他据此提出二重过程动机模型（Dual-Process Motivational Model, DPM）。该模型还进一步提出右翼权威主义和社会支配倾向在社会偏见产生的机制上存在差异，并且受到社会情境因素的影响。可以说，二重过程动机模型描绘的是一个包含个体人格倾向、社会信念、动机目标以及社会态度等多个因素与情景及外群体特征之间交互影响导致偏见产生的复杂系统（孙连荣、杨治良，2009）。

从群体层次展开的研究，关注偏见如何作为一种群体态度而产生并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偏见可以针对个体，也可以针对群体，产生于群体之间的偏见，具有迪尔凯姆所谓的“社会事实”特征，即客观性、集体性和强制性三个特点。我

¹ 《权威主义人格》是反映阿多诺该项研究的经典著作，国内有该著作的中译本，但翻译为《权力主义人格》。具体参见：（美）西奥多·W. 阿多诺等著，李维译，权力主义人格，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们需要注意这些特征，“这是一种强加于个人而后再由个人重复的团体状况。它存在于整体中的每个个体，是因为它已存在于整体，而不能说它存在于整体，是因为它已存在于个体”（迪尔凯姆，1995：30）。以人们对偏见的研究和认识，偏见常产生于群体之间，但是有意思的是，偏见通常是经由个人个体化的社会交往后所形成的，当然有时这种交往不必是真实的，也可以是在想象中完成的。偏见甚至也可以在完全没有接触的条件下产生，而此时的偏见更接近于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但是从群体的角度来看，偏见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刻板印象作为构成偏见的核心部分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内容（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82），泰弗尔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就将形成刻板印象的个体心理过程、社会心理过程和社会过程整合起来，从更全面的角度看待刻板印象，进而解释偏见这种现象（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

群体偏见突出群体成员对于社会群体的态度，这里的社会群体以不同的身份或标签来划定，但是不论划分为何种类型的群体，群体成员都有一个归属，即是否属于某个群体，如果属于某个群体就是内群体，否则就是外群体。而群体偏见则常来自于内群体对外群体成员的负面态度。

（二）对移民的偏见研究

不同种族和宗教群体之间的偏见由来已经，成为横亘在不同文明之间的藩篱。缺乏互动是造成群体偏见的重要原因，但是当互动增多的时候，偏见也不见得有所减少，特别是当全球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之时，对外国移民的偏见成为新的阻碍国家与国家间交往的心理障碍。中国目前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外国移民，但是国内大量外来人口的迁移流动造成了类似的场景。外来人口的到来给城市及其居民带来了难以明说的影响，而对外来人口的偏见就此生根发芽。国内关于偏见的研究多集中于社会心理领域，特别针对农民工、流动人口、城镇新移民等群体的相当少。朱力（2001）认为农民工进城后与城市居民的融合，是城市秩序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市民在与农民工的互动交往中，存在着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性歧视，但也有因农民工的活动条件与自身素质的限制而引起的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朱力虽较早地指出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但是他同样模糊了歧视与偏见之间的关系，而且市民的偏见到底受到制度性因素的何种影响也未言明。在另一个更早的研究中，学者围绕外来从业人口的大量涌入

导致社会治安状况下降及犯罪现象增多、外来从业人口加重了城市交通运输及基础设施的负担、外来从业人口涌入导致城镇人口就业难度加大、外来从业人口素质低，影响城镇文明环境建设四个针对外来从业人口的偏见，逐一从统计数据和理论分析的角度加以反驳（张智勇、陶育兵，1997）。由此可见，对城市外来人口的偏见自改革开放时期就开始存在，并一直“顽强”存在。

（三）研究问题

对外来人口的偏见，学术界关注得也不少，但是缺乏严谨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所以虽然感受到对外来人口的偏见，但是偏见的现状如何，它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如何消减偏见，仍然未得到明确的答案。

如果说对外来人口的偏见根本上来自于制度性因素，即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城乡二元分割，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这种制度遗产的效果还剩多少？市场经济是否培育了市民更具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新型城镇化要求更多的外来人口在城镇地区定居，而城市居民会对外来人口持有偏见吗？

本研究将目光集中在城市的中产阶层群体上，这个群体是改革开放后产生并不断扩大的一个社会群体，国内外学者对其投入了足够多的关注。本文研究中产阶层对外来人口的偏见，既是考察外来人口在城市融入中的阻碍有多大，也是观察城市中产群体在社会转型中所起的作用。

二、数据、变量和假设

（一）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文化资本与社会阶层调查”²，该调查的第一期于2013年完成，调查地点为福建省厦门市。由于本期调查为非入户调查，较难获得针对中产阶层的抽样框，所以采用非概率抽样方法。具体作法是参考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厦门市职业分布状况，再综合性别、年龄段、教育程度等因素进行配额抽样设计，最终通过判断抽样和雪球抽样完成样本选取，样本规模共计600个。

（二）变量

本研究的关键变量是城市中产阶层对外来人口的偏见，在测量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个语义差异量表来测量城市中产阶层对外来人口的印象。我们让受访者从

² 该调查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资本：我国城市中产阶层的生产和再生产研究”（项目编号：11BSH028）的支持。

5 个方面分别来判断自己对外来人口的印象，每个方面都从最负面的评价到最正面的评价来赋分。每个评价陈述都区分了 7 个态度等级，最负面的评价赋值 7 分，而最正面的评价赋值 1 分，受访者得分越高表明其对外来人口的偏见越强烈。这 5 个评价的维度分别是：恶的一善的、社会地位低—社会地位高、综合素质低—综合素质高、贡献非常小—贡献非常大、令人厌恶的一令人喜欢的。我们用这 5 个陈述的总得分来代表每个受访者对外来人口的偏见状况，我们计算了这 5 个项目之间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其值为 0.75，说明这 5 个陈述的内在一致性较高，整个量表的信度也较高。我们计算了每个受访者的偏见指数，如果受访者在某一项陈述上未填答，我们则用这项陈述的平均值来代替缺失。

除了偏见指数之外，本文还构建了其他主要的解释变量，分别是阶层差距认知指数、权威认同程度、自卑指数、社会交流意愿、跨社会地位的交往频率、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指数以及与外来人口交往的深度。此外还将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作为控制变量。阶层差距指数、自卑指数和社会距离指数都进行了信度测量，其 Cronbach's alpha 系数都超过了 0.7。与外来人口交往的深度以是否邀请过外来人口到自己家做客来测量，偏见指数及其他变量的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

连续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类别变量	比例 (%)
年龄	20	78	37.4	9.70	性别（男性）	50.3
受教育年限	9	19	16.0	1.82	婚姻状况（已婚）	80.5
偏见指数	5	35	19.1	4.03	是否邀请做客（是）	68.7
阶层差距认知指数	10	25	21.4	3.18		
权威认同程度	1	5	3.3	0.97		
自卑指数	5	15	7.4	1.99		
社会交流意愿	2	5	3.8	0.68		
跨社会地位交往频率	1	4	2.5	0.66		
社会距离指数	-5	5	-3.0	2.70		

（三）假设

中产阶层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偏见，不仅仅是一般的社会态度的表现，它是中产阶层在政治倾向上的延伸。我们注意到如美国、欧洲等地区的民众对外来移民

的态度往往夹杂着复杂的政治诉求（Stephan, Ybarra and Bachman,1999;Craig and Richeson,2014）。

提出如下几个假设：

假设1 个人认为阶层差距越大，其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偏见越强烈。

假设2 个人权威认同程度越高，其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偏见越强烈。

假设3 个人的自卑指数越高，其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偏见越强烈。

假设4 个人的社会交流意愿越强烈，其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偏见越弱。

假设5 个人的跨社会地位的交往频率越高，其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偏见越弱。

假设6 个人与外来人口的深层交往对其偏见有显著降低影响。

假设7 个人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指数越大，其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偏见越强烈。

三、分析结果

我们在模型拟合方面采取了三步走的策略，首先在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进行模型拟合，其次加入阶层差距认知指数、权威认同程度、自卑指数三个变量，最后加入其余的解释变量。模型拟合的结果见表2。模型1的拟合结果显示女性比男性更易产生对外来人口的偏见，这个结果同国外类似的研究相同，而年龄、教育年限及婚姻状况对受访者的偏见并没有显著影响。

模型2开始添加解释变量，阶层差距认知指数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假设1没有通过检验。该变量反映了受访者对当前阶层之间差距程度的认知水平，但是并没有作出价值判断，只有当表现出明确的政治态度时，对外来人口的偏见才会隐约出现。权威认同程度测量了个人对权威主义的认同程度，测量结果越高意味着个人具有更多的权威主义人格，依据以往的研究发现，一个具有较多权威主义人格的人，其对外部移民具有较高的偏见。但是在本研究中，拟合结果却与此相反，权威认同程度越高，其对外来人口的偏见越低，假设2没有通过检验。自卑指数能够显著地提高个人对外来人口的偏见程度，假设3通过检验。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对较高地位的社会群体，如社会支配群体的认同，会提高个人的自尊感，而当自卑程度提高时，个人不仅对理想参照群体的认同降低，他还会对潜在的地位竞争群体感到排斥，也就是当社会地位更低的群体将其作为认同群体时，个人表现出了一定的敌意和负面印象。

表2 中产阶层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偏见的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性别（女性=0）	-0.582 [*]	0.3308	-0.608 [*]	0.3292	-0.320	0.3196
年龄	-0.011	0.0209	-0.002	0.0212	-0.021	0.0207
受教育年限	-0.063	0.0958	-0.072	0.0953	-0.100	0.0917
婚姻状况（未婚=0）	0.035	0.4847	0.093	0.4848	0.283	0.4686
阶层差距认知指数			0.028	0.0546	0.052	0.0527
权威认同程度			-0.368 ^{**}	0.1725	-0.214	0.1684
自卑指数			0.162 [*]	0.0852	0.134	0.0830
社会交流意愿					0.083	0.2660
跨社会地位交往频率					-0.460 [*]	0.2684
社会距离指数					0.319 ^{***}	0.0669
是否邀请做客（否=0）					-1.007 ^{***}	0.3850
常数项	20.77 ^{***}	1.8700	19.94 ^{***}	2.336	22.47 ^{***}	2.447
R ²	0.006		0.024		0.111	

注：1. *, p<0.1; **, p<0.05; ***, p<0.01。

2. 模型样本量为 600。

模型3添加了社会交往类变量，一些期望降低甚至消除群体偏见的研究提出，群际接触的增多可以减少群体间负面印象，从而降低偏见（张琦等，2009）。但是关于此类观点的争议相当激烈，人们对群际接触的类型进行了详细分析，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群际接触可能会对偏见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社会交流意愿对偏见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说明在不区分交流对象和类型的情况下，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交流意愿并不能有效地预测偏见的变化，假设4没有通过检验。但是当说明交往对象后，特别是在有过交往经历的情况下，增加跨社会地位的交往频率确实能一定程度地降低偏见，假设5通过验证。而当这种交往是相对深入的交往，比如邀请外来人口到家里做客，那么对外来人口的偏见降低得更明显，假设6通过

检验。由此可见，群际接触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从更一般地角度来看，两个群体的社会距离越大，也就意味着群际接触的可能性越小，而偏见产生的可能性也相应提高，假设7通过验证。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文试图分析中产阶层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偏见目前达到何种水平，而偏见又受到哪些因素和途径的影响。由于研究资料的限制，我们以一个城市个案的数据发现，如果以样本中所测量到的偏见程度而论，中产阶层整体接近于中等水平。具体来看，女性比男性的偏见程度更强烈，年龄、教育年限及婚姻状况对偏见没有显著影响。对阶层之间差距程度的认知也不能有效预测偏见。对权威认同程度越高的中产阶层，其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偏见越低。个人越感到自卑就会产生越强烈的偏见。与一般社会成员的交流意愿对其偏见没有显著影响。社会距离对偏见的产生有显著的影响，中产阶层同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越大，对其偏见也就越强烈。群际接触对降低偏见有明显的效果，跨社会地位的交往越多，对外来人口的偏见也就越小，特别是有请过外来人口到家里做客的要比那些没有请过的，体现出更低水平的偏见。

（二）讨论

偏见是一种人格特质倾向还是产生于群体间的具有集体性的负面刻板印象？在本研究中，我们无意从两个角度进行辩驳。西方社会的中产阶层自产生之日起，一直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时至今日仍然是各方政客们不可忽视的重要势力。中产阶层更希望多一些变革，还是更愿意多一些平和，这是一个经验问题，而来自外部多种多样的呼声不能强加于这个特殊群体。米尔斯很早的时候就关注到中产阶层对自身地位的复杂情感，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中产阶层恐怕还要面对规模更大、情况更复杂的局面。中国的中产阶层产生于特定时空，同体制的关系更加紧密，这样一种天然的联系使得中国的中产阶层对地位更加在意。新型城镇化不仅意味着更多的人口在城镇地区重新立足，它还意味着对原有城市社会结构的冲击，以及对利益结构的挑战。国外移民机构及相关政策制定机构对本国国民对外来移民的偏见保持着特别关注，如欧盟及欧洲的很多国家都特别设立了相关机构，不断检视现有政策是否具有社会排斥的倾向，当然在国际形势复杂的情况

下，欧洲国家官方及民众之间对该项工作的认识存在着张力。

中国的情形不同于西方国家，但是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外来人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外部移民，他们同城市居民一样都是中国的国民，但是已有制度安排，将两个群体简单分类，彼此的标签清晰明了，群体之间的负面情绪和认识日积月累。城市的发展本来就是人群不断聚集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还是文化多样性的过程，我们的城市该怎么面对这个过程？群际接触似乎有助于减少偏见的产生，但是接触的类型和方式存在差异。涂尔干当年提出通过社会分工的方式来扩大有机团结，从而提高社会整合。中国的城市居民必须意识到，更多的外来人口将长期居留，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交往，有利于两个群体彼此认识 and 了解，消除偏见。

参考文献

1. 崔岩. 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社会学研究, 2012年, 第5期.
2. 迪尔凯姆著, 狄玉明译.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3. 黄家亮. 论社会歧视的社会心理根源及其消除方式——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的社会歧视. 思想战线, 2005年, 第5期.
4. 李琼、郭永玉. 作为偏见影响因素的权威主义人格. 心理科学进展, 2007年, 第6期.
5. 迈克尔·A·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 高明华译. 社会认同过程.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6. 孙连荣、杨治良. 社会偏见与群际威胁在群际冲突发生过程中的作用. 心理科学, 2009年, 第4期.
7. 杨宜音. 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 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 社会学研究, 2006年, 第4期.
8. 张琦、冯江平、王二平. 群际威胁的分类及其对群体偏见的影响. 心理科学进展, 2009年, 第2期.
9. 张智勇、陶育兵. 论对“外来从业人口”的偏见. 江淮论坛, 1997年, 第3期.
10. 朱力. 群体性偏见与歧视——农民工与市民的摩擦性互动. 江海学刊, 2001年, 第6期.
11. Allport, G. W. 1954.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2. Stephan, W. G., Ageyev, V. S., Stephan, C. W., Abalakina, M., Stefanenko, T., & Coates-Shrider, L. 1993. Soviet and American stereotypes: A comparison of method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6, 54-64.